



# 双辽的第一条铁路

刘科

## 修建南段四洮铁路



平齐铁路是双辽市境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其首段铁路是四郑铁路,四郑铁路工程局首任局长是虞恩。1916年3月,四郑铁路工程局筹备处成立,6月,四郑铁路工程局设立于四平街,原吉林铁路管理局局长虞恩兼任四郑铁路工程局局长,同年7月8日四郑铁路开始实测。双辽的铁路修建至今已经走过了106年的风雨历程。

平齐铁路全线归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分段管理,两公司分界点在平齐铁路453.3公里处。其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453.3公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181.1公里。平齐铁路交错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线路在内蒙古境内为31.8公里、在辽宁省境内为55.8公里、在吉林省境内为357.7公里、在黑龙江省境内为126.8公里。线路所经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温差大,冬季少雪寒冷。

平齐铁路修建历史比较复杂,具有区域跨度广、时代跨度大和修建时间长等特点。平齐铁路地跨范围涉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先后跨越清末、民国和北洋军阀(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等几个历史阶段。

四平至洮南间铁路是1908年清政府拟办的锦瑷铁路(锦州至瑷珲)的一部分。由于沙俄也企图在中国争办这一条铁路,清政府勘而未修。日本自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占有南满铁路后,利用各种机会,夺取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益。1913年秋,袁世凯派人赴日本要求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取缔国民党人在日本的活动,条件是愿出相当报酬。日本侵略者借机提出了“满蒙五路”计划,作为承认的条件。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令外交总长孙宝琦与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签订了《借款修造铁路预约办法大纲》,即所谓的“满蒙五路换文”。通过这个换文日本取得了:一、四洮(四平街至洮南)、开海(开原至海龙)、长洮(长春至洮南)三条铁路的借款权;二、洮热(洮南至热河省承德)、吉海(吉林至海龙)二路修造时,需借用外资先向日本资本家商谈,日本实际上已经取得这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

1915年12月,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方正金银行签订《四郑铁路借款合同》,借日款500万元(后又续借260万日元),四洮铁路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承办,先修四郑段(四平街至郑家屯)。1916年3月四郑铁路工程局筹备处成立,6月设四郑铁路工程局于四平街。满铁由腾根总工程师等职员参加。7月8日四郑铁路开始实测,10月20日完成测量工作,然后进行设计,设计完成后于1917年4月15日动工修建,同年10月31日完成路基工程,11月末完成轨道铺设工程。1918年1月11日四郑铁路开始临时营业。1918年9月25日,四郑铁路正式通车。四郑铁路建成时全长87.9公里(该线因1933年避让河水害时改线延长4.9公里,共92.8公里)。全线开通时共设四平街站、泉沟站、八面城站、曲家店站、傅家店站、三河口站、一棵树站(即今天的金宝屯站)、郑家屯站等8个车站。线路所用钢轨购自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制造的43公斤/米钢轨。全线均为木结构桥梁,最长的木桥是辽河桥,全长648.5米。四郑铁路不置备机车和车辆,全部向南满铁路租借使用。四郑铁路自1918年1月1日正式通车之日起,就与南满铁路办理客货联运,行车指挥大权也操在日本人手中,名义上是中国国有铁路,实际上是南满铁路的支路。

郑洮铁路全长228.1公里,1919年2月由郑家屯、洮南两侧分头测量,7月完成定测,1922年5月进行复测。1922年6月郑洮铁路路基工程开始施工,10月辽河大桥施工。施工中根据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指示改移太平川站位置,自194公里至204公里进行了改线,1923年3月末路基工程完工,9月30日完成桥梁工程。1923年3月29日,开始人工铺轨,6月14日改用简易铺轨机。1923年7月修到太平川开始临时营业。10月27日铺轨至洮南。钢轨系购自南满铁路换下来的32公斤/米的再用轨,枕木、道钉也由南满铁路代购,接着继续铺设洮南站线和机车库线,10月31日完成全线铺轨。11月1日郑洮铁路全线开始临时营业,接着完成了各种设施。至此,经过8年多时间四洮铁路全线于民国13年7月1日即1924年7月1日正式通车营业。郑洮铁路开通时设14个车站,其中衙门台站(今保康站)在今通榆市境内。

四洮铁路局的日籍职员为了控制四洮铁路,日本方面在日中之间签订的《四洮铁路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日方人员在四洮铁路要害部门所占位置,而在实际执行中有些没有条约约定的部门也聘用了一些日本人。在四洮铁路货物专用线上有日本人9名,在四洮铁路局机关还有10多名日本人。这些日籍职员在四洮铁路局主要担任技术管理、运输管理等工作,他们的工作既清闲又索取高薪。在四洮铁路工作的日籍职员比在南满铁路工作的日籍职员同等岗位薪资要高出三四倍,多者每月200元,少者每月80元至140元,比一个中国工人要高十来倍。(上)

## 梨树二中的演变由来

魏晓光

1923年2月,梨树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在梨树书院成立,仅招男生,学制三年,招一个班。七年时间毕业200人。

1925年,梨树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师范讲习科及第一高等小学三校合署办公,规模最大,校长姜勋忱,教务主任为赵芳亭,训育主任为徐丕璠。师范讲习科设2个班,招收81名学生。

1930年,在第一初级中学校内增设第二初级中学,校长王守忠。第二初级中学仅招收女学生,学制三年,开设两个班,每期招收学生50名。七年后,第二初级中学迁至四平街。

1938年,奉天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更名为梨树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校长为张云赞,校长室设在文庙的明伦堂,正门两侧刻有汉代董仲舒名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楹联。学校教员30名。学制改为四年制,招收国民优级学校毕业生。1940年,每周增设2节军训课,每年有3个月安排学生参加劳动和劳役。

1945年初,校长王大泽,副校长为日本人西国义。学校有22名教员,8个教学班,388名学生。课程除设置国文、数学等基础课,还设日语、国民道德课,并设农业、土壤、育种3门专业课。

1945年10月,梨树县立政府建立梨树中学,聘邵梦周为校长,设6个班,在校学生300名,留用原大部分教师。数理化课程沿用旧教材,文史课程教材由老师自行选用或临时编写。

1946年5月,国民党占据梨树后,设男中、女中各一所,校址在现梨树二中位置。男中校长为王士俊,女中校长为邵梦周。同年秋,男中、女中合并称梨树中学,校长白广田,教职工20名。设初中、高中,学制各为三年。开设4个班,学生160名。1947年夏,因战争停课。

1948年9月,恢复梨树中学。设6个初中班,并附设师范班,教职工13名,学生204名。

1949年,校长任遇春,学校有14个



班,教师28名,学生661名,并设有农民干部训练甲、乙两班。1951年设榆树台分校,8个班。1952年设高中部2个班,学生88名。

1958年11月,梨树中学高中部独立,称梨树一中,第二年迁出到现址。从此,梨树中学更名为梨树二中。

## 四平市地名由来

一面城是四平最早的名称,在今城东乡仍有一面城村,尚有遗址。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决定修筑哈尔滨至旅大的支线。当年即进入四平地段实地勘察,并决定在此设站。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顺口至公主岭区间通车,四平始称“五站”,这是四平的第二个名字。“五站”之名的由来,得从沙俄修建中东铁路南满支线说起。

五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改称四平街的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1931年四平街正式用于火车站名,称四平街站,废除五站名,将原四平街电改称老四平。第二种说法:原叫五站,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将五站改叫四平街站。第三种说法: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正式站名就叫四平街站了。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日本人叫安藤喜,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四平街的趣味》,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作者来到四平街,在火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作者惊奇地发现,墙上放着一个俄国人留下的站牌,在这个唯一的纪念品

上,用俄文书写的站名恰恰是“四平街站”。作者由此推断,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也就是说在日俄战争之前,正式站名就叫四平街了。

退一步说,这个俄国站牌至少可以说明,早在日本人接管中东铁路之前,俄国人已经称五站为四平街站了,而且已经挂上了俄文的站牌子。火车站从老四平那里借用了四平街的名字后,不仅五站改名为四平街站,以火车站为中心不断扩大的新街区也随着叫四平街了,“一面城”、“五站”这两个名字渐渐被人忘却了。四平街的工商业越来越繁荣了,新“四平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而“老四平街”则变得默默无闻了。

四平街名是借昌图县四平街(今老四平)之名,先为火车站名,后演变为市区的总称。这些今天已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四平街”这个地名又是如何来的呢?

公认的一种说法是,老四平距四周几个较大的集镇距离相同:东至半拉山门,西至八面城,南至莺鹭村,北至买卖街(今梨树镇),距4个集镇皆为20公里,故名四平。《昌图府志》中对此有相同的记载:“其

道里距离皆相若,为四达之衢,故以名为。”

第二个说法接近前一个,因此地是哈大线、平齐线和四梅线的交叉点,有四通八达的意思。可是按这个说法,“四平”之名是产生于这些铁路建成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而且“四通八达”与“四”、“平”也有些牵强。

第三种说法是,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弘历巡幸吉林途经四平街(老四平)时,见此地势平坦,四望无垠,因此以“四平”名之。

第四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有专家考证,说四平系满语,直译为锥子,指此地一条河流又细又直,像锥子一样。

1941年,伪满洲国成立四平市,四平市为省会,辖四平街、公主岭、通阳三县。

1945年,四平市为辽北省省会。1947年6月将四平市、兴安南省合并,称辽北省,仍在四平市街,但略去“街”字,改四平市为四平市,省公署驻四平市。四平市街亦改为四平站。

(区划地名处供稿)

## 第二编

#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组织是由早稻田大学的东北籍学生侯洛、田琛、高亮等人于1937年8月自发建立的。其宗旨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拥护新民主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回东北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要求会员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同年秋,社会科学研究会改称新知识研究会。

三是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它的创建者赵冬、夏航等人也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回国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2月,经3个组织成员共同讨论决定,将东京反帝大同盟、新知识研究会、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合并为一个组织,定名为“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推举赵家斌、侯洛、田琛为领导成员。到1939年底,已发展会员60余人。

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早在1937年6月张为先就返回国内寻找党组织。他在北平经中共党员何松亭介绍,与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长南汉宸接上组织关系。南汉宸听取张为先的汇报后,首先肯定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的成绩,希望他们利用这个组织,做好东北的工作。为此还必须建立一个由张为先负责的情报组织。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

根据南汉宸的指示,张为先于此时已回国的丁宜在奉天建立了党的情报组织“党社”,其成员还有巩天民、谢博生、何松亭等,联络地点设在奉天志成银行,他们以银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奉天、新京等地从事情报工作。从此,东北青年救亡会正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8年7月到1940年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主要成员赵家斌、高亮、田琛、侯洛等人相继回国,聚集在伪都新京(今长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领导机关也随之迁到新京。1940年4月,总部迁至奉天,与张为先、丁宜领导的“党社”接上了组织

关系。从此,东北青年救亡会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情报组织,隶属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除奉天总部外,在新京、哈尔滨设有救亡分会。

对于这样一个处在敌伪统治中心的地下情报组织,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重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领导,经常派干部到东北指导他们的工作。为了明确领导关系,决定把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名称改为中共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总会。

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主要任务是打人伪满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建立阵地,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系统搜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警特方面的情报,以掌握日伪上层动向为重点,不参与集会、散发传单等具体的抗日反满活动。这对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来说是有着便利条件的:

第一,会员们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官僚、资本家、地主家庭,有的人就是伪满汉奸的子弟,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伟,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的弟弟于静纯,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儿子的王诚和侄子王谦,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完东,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彬等,都是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会员。

第二,会员多数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的交往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如高亮与张绍伟、张绍纪经常以会友和学术研究问题为名,频繁出入张府,把一些进步书籍和重要情报存放在张绍纪的书房。夏航曾担任过张绍纪的家庭教师,在张公馆后院的一个屋子里给张绍纪教书。因此,救亡会的很多会议就是在这间屋里召开的,张景惠和他的秘书松木英雄,从未怀疑过这些来找张绍纪的人。曾经担任伪满三江省警务

厅特高课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的岛村三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深感惊讶地说:“当时我们都拼命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出去是多么容易!”

第三,这些人都接受过日本的高等教育,既能熟练地掌握日语又有较高的专业才干,因此,比较容易打进日伪伪脑机关和重要的军事、经济、新闻等部门,用合法的职业做掩护,去搜集重要的情报。

如1938年回国的高亮等人,被分到“满洲国通讯社”当记者后,借采访之便经常进出伪国务院总理府、军事部、经济部、交通部等要害部门。1940年春回国的一批会员,有很多人进入了伪满国务院八大部大臣秘书室、总务厅弘报处、协和会中央本部、伪中央银行、伪满军、伪满警察局等重要单位任职。张绍纪还当上了奉天丸山制纸株式会社的社长,这样使他既能同工商界名流接触,又能通过做生意搞到一些活动经费。

正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不仅成功地打入日伪的军政要害部门,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而且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很好地隐蔽了组织,保护了个人,成为中共抗战时期在东北沦陷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情报组织。

1943年春,长春市“救亡会”组织,派成员王谦(曾用名:王恒绪、李裕)到四平开展地下情报工作。王谦到四平后,经私人介绍,在四平市商工会任调查股股长,王谦以此公开社会职务为掩护,建立起四平地工情报点,通过开展社交活动,有一些有反日情绪的青年建立了友谊,熟悉四平情况,初步掌握了汉奸的名单。(未完待续)

